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第 10 卷
第 2 期
(总第 35 期)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岳昌君；

编辑：孙冰玉

学生干部经历是否是大学生发展的捷径？

达睿，杨钊¹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100871)

摘要：学生干部是高校学生工作的有力载体，但是我国对学生干部经历与学生个体发展的关系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运用学生参与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利用北京大学 2010 和 2011 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本科生问卷》数据，通过均值比较、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了学生干部经历、学生参与和学生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学生干部经历对学习性参与和社会性参与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学生干部经历通过学习性和社会性参与对个人的学业发展、思考和认知能力发展、人际交往与领导力发展以及社会意识发展，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同级别学生干部的发展程度不同。由此可见，提高学生参与是培养学生干部的有效途径，而对学生干部的培养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关键词：学生干部经历，学生参与，学生发展

Is Student Leadership Experience an Effective Way for Promoting College Development?

Rui DA, Po YANG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KU)

Abstract: Student leaders are strong supporters for student affair services in college.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experience and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study intends to address this knowledge gap. It utilizes the student engagement theory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uses data from 2010 and 2011 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 Surveys administrated by a research team from Peking University.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ean comparison, and ordinary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this study finds that student leadership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to student engagement. Besides, student leadership experience can improve student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student academic and social engagement. In conclusion, increasing student engagemen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 leaders. Student leadership training is conducive for enhancing students' overall level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student leadership experience, student engagement,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¹ 达睿，1986，女，汉族，新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校管理。杨钊，1976，女，汉族，北京，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通讯作者地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81信箱，100871。联系电话：010-62763377。电子邮件：poyang@pku.edu.cn。本研究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监测项目》课题成果之一。

1. 高校学生干部发展的现状与挑战

高校学生干部是大学生中综合素质相对较高的骨干群体,他们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与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担负着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职责,在联系学校、教师与广大同学、促进学校发展与稳定、服务大学生成长成才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¹。

高校学生干部广泛分布在校内各级学生党团组织、学生会、班委会及各类学生社团中,目前高校在任学生干部的数量超过了在校大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²。根据“2010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显示,在大学期间各年级有过学生干部经历的学生比例高达49.2%。在学生干部群体中,约有半数曾担任班级干部,36%曾担任院系级干部,15%曾担任校级干部。有过学生干部经历的学生比例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提高。调查显示一年级有过学生干部经历的学生比例约为41%,到了三、四年级提高到52-53%³。这一方面表明高校提供了充足的参与机会,另一方面也显示大学生对参与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具有很高的热情。

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⁴以后,各高校都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提到了学生工作的首要位置。高校学生干部是大学生中的优秀群体,对学生干部的培养首当其冲地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切入点,被看作是高校学生工作管理体系的有力载体。2006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在参加全国加强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学生的培养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是培养和造就大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需要,是引导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是促进高校健康发展的需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⁵

最近一段时期,众多高校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资源,加强学生干部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开展学生团校、精英学校等一系列学生干部专项培养活动,将学生干部培养工作作为最重要的学生工作之一。截止2011年6月,北京大学已举办二十七期高级团校,强调团校应紧密围绕学校各项中心工作,牢牢把握北大共青团的发展方向,不断探索新时期、新形势下学生骨干培养工作的规律特点⁶。清华大学也将暑期团校作为共青团工作中长期坚持和发展的一项优良传统,至今已开办二十四期⁷。

¹ 何旭娟.新时期高校学生干部群体发展现状与培养对策——以湖南高校为例[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30):163-166.

² 江志斌.高校学生干部群体行为特征分析及启示[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1(19):140-143.

³ 作者根据2010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统计。

⁴ 中发【2004】1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⁵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团中央全国学联研究部署加强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工作[EB/OL],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4606153.html>.2006-7-19.

⁶ 北京大学新闻网,北京大学第二十七期团校结业典礼顺利举行[EB/OL],
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1-06/09/content_202930.htm.2011-6-9.

⁷ 清华大学新闻网,清华暑期团校促共青团学生干部成长

之所以将学生干部培养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除了学生干部可以在广大学生群体中产生思想引领和自我管理的作用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自身发展会产生积极影响,对学生干部的培养会提高学生群体的整体素质。有研究指出与普通大学生相比,优秀学生干部具有更为出色的社交公关素质¹。高年级学生干部可以引导、监督和帮助大学新生形成良好的学风,在新生学风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²。但也有研究指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逐步转变,高等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生干部中逐渐显现“官僚化”倾向。具体表现为学生干部组织机构部门众多,人员膨胀,工作效率低下;学生干部脱离群众,服务意识淡薄,热衷权力,盲目追求政绩等³。因此,学生干部经历未必会对学生发展产生正面促进作用。

学生干部经历究竟会给大学生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近期大规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的分析来回答:(1)学生干部经历是否影响学生发展?(2)具体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如何?即如果学生干部经历会对学生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通过何种渠道发生的?

目前针对学生干部培养的研究中,学者多将关注点放在了如何改进学生干部的培养机制和如何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这些政策性问题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探索对学生干部的培养如何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⁴。换言之,学者们尚未采用实证方法证明学生干部经历是否对学生学业和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也没有论证学生干部经历究竟如何影响个人的发展。本研究尝试探讨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能力发展的影响途径,并定量地确定干部经历对学生自身发展的作用。

在研究视角的选择上,国内现有研究多数采用宏观分析视角,从整体上思辨地分析学生干部的群体特征⁵,鲜有学者将学生发展理论——尤其是学生参与概念引入对学生干部的微观研究。通过对美国大学生的多年研究,Astin指出学生只有积极参与到高校的各项活动中才能学得更好,学生在有意义的活动中投入时间越长、付诸的努力和精力越多,收获越大⁶。Kuh进一步提出了“学生参与”的概念⁷。这一理论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学生干部经历如何影响学生发展。学生干部与普通同学在学习性参与和社会性参与方面可

[EB/OL].<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05/2011/20110225232319406431578/20110225232319406431578.html>.2009-8-29.

¹ 王益明,金瑜.普通大学生、三好学生及优秀学生干部人格特征的比较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4:44-49.

² 程程,冯翊,杨建军.浅谈高年级学生干部在大学新生学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J].现代教育科学,2012,2:24-24.

³ 徐晓蕾.高校学生干部“官僚化”倾向的剖析——基于南通大学的个案研究[D].江西:华东师范大学.2008.

⁴ 何旭娟.新时期高校学生干部群体发展现状与培养对策——以湖南高校为例[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30):163-166.

⁵ 江志斌.高校学生干部群体行为特征分析及启示.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1(19):140-143.

⁶ Astin A.W.. *Student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theory for higher education* [J].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ersonnel, 1984, 25: 297-308.

⁷ Kuh,G.D.Kinzie,J.,Buckley,J.A.,Bridges,B.K.,&Hayek,J.C.. *What Matters to Student Succes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National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Cooperative(NPEC) Commissioned Paper. 2006.

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学生干部的研究中学生参与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概念。本文首次尝试在学生参与视角下分析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个体发展的影响。

除了选择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对高校管理实践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何更好的进行学生干部培养工作,完善学生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学生干部综合能力的提升,均需要可靠数据分析的支撑与理论指导。本文旨在从学生参与的视角对学生干部和普通学生的能力发展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学生干部经历影响学生发展的程度和具体模式,进而对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和大学生自身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2. 学生参与视角下的学生干部经历与学生发展

2.1 学生参与理论

学生发展理论是国外近年来分析高校学生经历与发展的主要理论工具。该理论聚焦在学生个体发展的不同层次和各个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学生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四种类型:个体与环境类理论、社会心理类理论、认知和价值观类理论、整合型的理论¹。其中,个体与环境类理论强调学生个体与大学环境的相互作用,它解释了大学的校园环境怎样影响学生发展,包括学生社会心理、认知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个体与理论的代表有 Astin 的“输入-环境-输出”模型²,Astin 的“学生参与”理论³,Sanford 的“挑战与支持”理论⁴,以及 Bronfenbrenner 的“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⁵。

对于学生参与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70 多年以前⁶,之后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与学生参与相关的概念框架和测量模式。Pace 在“努力质量”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当学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与同伴和老师针对实际问题进行互动时,学生将在学习和校园经历的其他方面得到更多的收获⁷。Astin 提出了“学生参与理论”(Student Involvement),他认为学生参与是指学生全身心投入到大学经历中的时间和精力。该参与理论认为学生在大学经历中的参与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个体的学习和发展⁸。Pascarella 在他的“变化评定模型”中指出影响学生发展的首要因素不是学校规模、结构和组织特征等硬件指标,

¹ 克里斯汀·仁著,李康译.学生发展理论在学生事务管理中的应用——美国学生发展理论简介[J].高等教育研究,2008,3(29):19-27.

² Astin A.W.. *Four Critical Years: Effects of College on Beliefs, Attitudes, and Knowledge*[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7.

³ Astin A.W.. *Student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theory for higher education* [J].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ersonnel, 1984, 25: 297-308.

⁴ Sanford N.*Developmental status of the entering freshman*[M].American college. New York: Wiley,1962. 253-282.

⁵ Bronfenbrenner U.*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⁶ Merwin, J. C. “Historical Review of Changing Concepts of Evaluation.” In R. L. Tyler (ed.),*Educational Evaluation: New Roles, New Methods: The Sixty-Eigh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M]. Part 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⁷ Pace,C.R..*Achievement and the Quality of student Effort*[M].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Education.1982.

⁸ Astin A.W.. *Student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theory for higher education* [J].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ersonnel, 1984, 25: 297-308.

而是学生与高校内部环境和群体的互动以及融合程度¹。

Kuh进一步提炼出“学生参与”(Student Engagement)的概念²。他首先研究了大学前经历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其后, Kuh深入分析了学生参与的若干方面。他的研究表明师生交流可以激励学生在有目的的教育活动中投入更多的努力; 同伴交流可以直接影响学生的学术发展、知识获得、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以及学生的自尊; 课外活动参与可以对学生的大学成就和能力发展产生正向影响; 学生满意度与学生参与度高度相关。他还分析了第一代大学生、其他种族学生、留学生、交换学生、社团成员、学生运动员等特殊学生群体的参与模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Kuh在对社团成员的分析中提到, 加入社团组织的学生在教育有效实践上比其他学生有更高的参与度^{3,4}, 参与度包括他们在课堂内外的努力程度。此外, Kuh还将院校环境引入分析模型, 指出院校结构、组织规模、活动组织、教学方法、校园文化等方面均会对学生参与产生影响⁵。

近年来对学生参与的分析已经成为了国外研究学生发展的主流范式。因此本文选择学生参与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关注学生参与理论视角下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2.2 相关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研究中关于学生参与对学生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较少。少数从学生参与视角考察学生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肯定了学生参与的积极作用。

例如, 陈萍⁶结合清华大学 NSSE-China 以及陈琼琼编制的大学生就读经验问卷, 设计了“湘潭大学学生参与度调查问卷”。根据对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均值比较, 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大学生整体参与度水平不高; 不同个体特征的学生参与度水平存在差异; 校园环境因素与学生参与度显著相关; 学生参与度对个人发展有积极影响; 学生参与度对满意度有积极影响。

利用学生参与理论, 孙沛睿对大学生课外参与投入的适度性进行了研究⁷。她综合了

¹ Pascarella, E. T. College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Learning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and Synthesis. In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1, edited by J. C. Smart, 1-62. New York: Agathon, 1985.

² Kuh, G. D., Kinzie, J., Buckley, J. A., Bridges, B. K., & Hayek, J. C. *What Matters to Student Succes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National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Cooperative (NPEC) Commissioned Paper. 2006.

³ Hayek, J. C., Carini, R. M., O'Day, P. T., and Kuh, G. D. *Triumph or Tragedy: Comparing Student Engagement Levels of Members of Greek-Letter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Students* [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02, 43(5): 643-663.

⁴ Hayek, J. C., Carini, R. M., O'Day, P. T., and Kuh, G. D. *Triumph or Tragedy: Comparing Student Engagement Levels of Members of Greek-Letter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Students* [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02, 43(5): 643-663.

⁵ Kuh, G. D., Kinzie, J., Buckley, J. A., Bridges, B. K., & Hayek, J. C. *What Matters to Student Succes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National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Cooperative (NPEC) Commissioned Paper. 2006.

⁶ 陈萍. 高校学生参与度实证研究[D]. 湖南: 湘潭大学. 2011.

⁷ 孙沛睿. 大学生课外参与投入及其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0.

Astin的“输入-环境-输出”模型、“社会与学术整合互动”分析框架、院校行动模型、一般化因果关系模型等院校影响力理论,建立了相应的计量模型。利用2008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该研究证明了学生自学和课外活动参与存在适度区间,且投入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边际作用递减;课外自学、课外活动参与、积极课堂参与对不同维度的学生发展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同;不同类型院校学生课外自学和课外活动参与投入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有所差异。利用类似数据,鲍威的研究也发现学生的学习行为、课堂内外的投入与参与对其学业成绩的提升、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¹。

在对辅导员个性化深度辅导的研究中,朱红以Pascarella在1985年提出“变化评定模型”为基本理论框架,使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8年度“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和学习参与对深度交流可能性的影响显著,学业成绩相对落后、学习参与程度较低的学生进行深度交流的可能性会增大²。

利用我国大学生发展调查数据,这些实证研究充分肯定了学生参与的提高会对学生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对学生干部群体的参与和发展进行专门研究,学生干部的学生参与度和发展情况有待进一步讨论。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结合Kuh的“学生参与理论”,本研究主要关注学生干部经历、学生参与和学生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了以下三个基本假设:

第一、学生干部经历会对学生参与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学生干部在学习性和社会性参与方面显著高于普通学生。这主要基于两点观察。首先,学生干部有更大的意愿参与有效教育实践,尤其是课外社团活动。其次,基于他们的特殊身份,高校会为学生干部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包括与高校内部各种组织的沟通和交流、专门培训等。

第二、学生参与对学生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一假设主要建立在理论和以往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陈萍、孙沛睿和鲍威的研究均表明积极的学生参与促进我国高校学生各方面的发展。

第三、学生干部经历通过学生参与对学生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学生干部经历通过学生参与这个中介变量,促进学生各方面的发展。这一假设阐述了学生干部经历

¹ 鲍威.未完成的转型—普及化阶段首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与学生发展[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8(1):1-16.

² 朱红.个性化深度辅导与大学生发展的实证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8(1):45-62.

作用于学生发展的影响机制。

3.2 数据、样本和变量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由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共同组织进行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本科生问卷)》(以下简称“调查”)。在分析中本文主要运用2010年调查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运用2011年调查的数据进行拓展性分析。调查问卷分为学生特征、高校环境、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学生参与、学生学业成就六个部分。该调查自2006年起每年实施,并不断修订问卷,在数据的信度和效度上均有较高的可靠性¹。

2010年该调查共发放问卷33400份,覆盖北京地区各类院校80所,实际回收问卷36492份,回收率为109.3%。2011年该调查共发放问卷31890份,覆盖北京地区各类院校63所,实际回收问卷25592份,回收率为80.25%。本研究选用两年调查中均覆盖的56所院校数据²。

由于多数学生的干部经历在大学前三年完成,同时大三也是多数学生干部级别最高的时期,故本研究选择三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分析样本。2010年三年级学生样本共10171人,2011年三年级样本共4998人³。

结合孙纳睿(2010)的研究,本研究选取学生发展状况作为计量分析的因变量,并分为学业发展和能力发展两部分。学业发展以“上学期平均成绩”衡量(D1)。能力发展使用调查数据中22项综合评估学生的知识、素养和能力水平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⁴。本研究对四个因子分别定义如下:(1)思考和认知能力(D2);(2)社会意识(D3);(3)人际交往与领导力(D4);(4)学术能力(D5)。对2011年数据做相同分析,各因子包含项目基本与2010年样本数据一致。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学生干部经历。使用2010年数据,本文选用是否具有学生干部经历作为第一自变量。利用2011年“调查”数据,我们又选用学生干部级别作为第二个自变量⁵。

¹ 2011年《首度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项目——本专科生调查分析总报告》中指出,2010年“调查”各个核心要素主要维度的组合信度比较理想,除了阅读量稍低(0.630)以外,其他测量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大多在0.80以上。

² 其中985院校7所,211院校15所,一般本科院校24所,高职高专院校2所,民办、独立院校8所。

³ 从学生性别看,2010年数据中男生占46.2%,女生占53.8%;从院校类型看,“985工程”高校占24.8%，“211工程”高校占27.0%，一般本科院校占44.9%，独立学院占1.8%，高职高专院校占1.5%；从专业分类看,文史哲类占18.5%,经法教管类占31.6%,工学类占21.2%,理农医类占28.7%;从生源地看,38.1%来自县镇村。2011年样本分布与2010年类似。

⁴ 针对能力发展选项,对样本数据进行KMO检验结果为0.941,大于0.5,表明取样足够;Bartlett球形检验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适合利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在因子分析中,利用2010年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作为提取方法,进行最大方差旋转。我们共提取了特征值大于1的四个因子,它们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58.3%。限于篇幅限制,具体因子结构不在此处显示。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⁵ 根据2010年“在大学期间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一题的数据定义一个虚拟变量L,1为担任过学生干部,

根据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本文将学生参与程度作为计量模型的中间变量。我们将 Kuh 提到的学生参与的若干方面归纳为学习性参与和社会性参与两个方面。首先, 学习性参与 (E1) 定义为一个连续变量。它由“课外阅读量”、“作业量”、“学习时间”加总而生成¹。其次, 社会性参与 (E2) 也定义为一个连续变量, 它由“课外活动参与情况”和“与辅导员交流情况”加总构成²。

此外, 本研究选取学生背景和院校环境作为控制变量。学生背景包括个人性别、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所在地、家庭收入、专业、高考分数, 而院校环境包括高校类型。

3.3 模型选择

结合 Kuh 的“学生参与理论模型”, 控制学生背景、院校环境等因素, 本文构建了学生干部身份对学生参与的直接影响模型 (1) 如下:

$$E_m = \alpha_{m0} + \alpha_{m1}L + \alpha_{m2}male + \alpha_{m3}pedu_1 + \alpha_{m4}pedu_2 + \alpha_{m5}loc + \alpha_{m6}inc \\ + \alpha_{m7}Dmaj_1 + \alpha_{m8}Dmaj_2 + \alpha_{m9}Dmaj_3 + \alpha_{m10}sco + \alpha_{m11}DU_1 \\ + \alpha_{m12}DU_2 + \alpha_{m13}DU_3 + \alpha_{m14}DU_4 \\ + \mu_{1m} \quad (m = 1, 2) \quad (1)$$

其中因变量 E1 代表学习性参与, E2 代表社会性参与。自变量为 L, 代表学生干部。控制变量中, male 为性别, pedu1 代表父亲受教育年限, pedu2 代表母亲受教育年限, loc 代表家庭所在地, inc 为家庭年收入 (万元)。Dmaj 代表专业大类, 工科为对照组, 文史哲 (Dmaj1=1), 经教管 (Dmaj2=1), 理农医 (Dmaj3=1)。sco 代表高考标准分。DU 为院校类型, “一般本科”为参照组, “985 高校” (DU1=1), “211 高校” (DU2=1), “高职高专” (DU3=1), “独立学院” (DU4=1)。为进一步分析各级别学生干部对学生参与影响的差异, 我们将模型 (1) 中学生干部经历自变量 (L) 用各级别学生干部虚拟变量 (DL1, DL2, DL3) 代替, 重复模型 (1) 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学生干部经历是否通过影响学生参与从而影响学生发展状况, 将学生干部经历和学生参与同时放入模型, 其中学生参与作为中间变量。但是如模型 (1) 显示, 学生干部经历与学生参与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为解决上述模型中学生干部与学生参与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 我们使用模型 (1) 的残差项替代学生参与变量带入模型 (2)。模型 (1) 的残差项代表了学生参与中不能由学生干部等变量解释的部分, 与学生干部变量不相关, 但是与学生参与高度相关。因此, 这个新建立的模型 (2) 检验了学生

0 为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根据 2011 年数据建立三个虚拟变量, 将非学生干部作为对照组。DL1=1 为班级学生干部, DL1=0 为非班级学生干部。DL2=1 为院级学生干部, DL2=0 为非院级学生干部。DL3=1 为校级学生干部, DL3=0 为非校级学生干部。

¹ 课外阅读量用“阅读书籍数”和“平均每周阅读文章数”表示; 作业量用“平均每周完成作业份数”表示, 学习时间用“平均每周上课时间”表示。得分越高表明学习性参与程度越高, 反之亦然。

² 课外活动参与情况由 10 种不同活动的参与频率得分加总而生成。“与辅导员沟通情况”由 11 种不同内容的与辅导员交流频率得分加总而生成。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性参与程度越高, 反之亦然。

干部经历和学生参与对学生发展的独立影响。

$$D_k = \gamma_{k0} + \gamma_{k1}L + \gamma_{k2}\mu_{11} + \gamma_{k3}\mu_{12} + \gamma_{k4}male + \gamma_{k5}pedu_1 + \gamma_{k6}pedu_2 + \gamma_{k7}loc + \gamma_{k8}inc + \gamma_{k9}Dmaj_1 + \gamma_{k10}Dmaj_2 + \gamma_{k11}Dmaj_3 + \gamma_{k12}sco + \gamma_{k13}DU_1 + \gamma_{k14}DU_2 + \gamma_{k15}DU_3 + \gamma_{k16}DU_4 + \mu''_{3k}$$

(k=1,2,3,4,5) (2)

其中因变量 D1 代表学生学业发展状况；D2 为思考和认知能力；D3 代表社会意识；D4 代表人际交往与领导力；D5 代表学术能力；L 为学生干部。 μ_{11} 代表模型 (1) 中学习性参与 E1 的残差； μ_{12} 代表模型 (1) 中社会性参与 E2 的残差。其他控制变量定义同模型 (1)。为进一步分析各级别学生干部对学生发展状况影响的差异，我们还将模型 (2) 中学生干部经历自变量用各级别学生干部虚拟变量代替。

4. 学生干部经历和参与对学生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干部经历对学生参与具有积极影响

在简单均值比较和 T 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控制学生背景、院校环境等因素，将 2010 年样本数据带入模型 (1) 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来判断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参与的影响是否显著。分析结果参见表 1。

表 1 学生参与度影响因素分析 (学生干部虚拟变量)

	学习性参与	社会性参与
学生干部	2.555*** (.741)	4.260*** (.291)
男性	-1.280 (.789)	1.503*** (.309)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4 (.153)	.043 (.060)
母亲受教育年限	-.039 (.145)	.068 (.057)
城市生源	-1.014 (.853)	-1.395*** (.333)
家庭全年总收入	.003 (.033)	-.023* (.013)
文史哲虚拟	-3.327*** (1.230)	.816* (.476)
经法教管虚拟	-3.304***	.556

	(.980)	(.388)
理农医虚拟	.481 (1.040)	-.798* (.411)
高考标准分	1.203** (.515)	-.763*** (.190)
985 虚拟	-.997 (1.132)	2.647*** (.434)
211 虚拟	-.706 (.969)	2.085*** (.381)
高职高专虚拟	1.936 (7.580)	4.814* (2.894)
独立学院虚拟	-.953 (3.273)	-1.439 (1.307)
(常量)	55.681*** (1.678)	50.613*** (.665)
调整 R 方	.007	.047

注：回归系数为未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

表 1 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1，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的学习性参与和社会性参与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 1% 的显著水平上）。与非学生干部相比，学生干部的学习参与程度高 2.55 个单位。以往研究表明，有时学生干部难以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冲突关系，工作对学习影响较大，且逃课的现象也比较普遍¹。本研究的结果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即发现学生干部在学习性参与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一发现意味着学生干部在高校学生日常的学习中，拥有比非学生干部更加主动的学习态度，更加明确的学习动机，并且也确实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学习行为。

本研究同样发现学生干部在大学期间的社会性参与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与假设和一般观察相符合。首先，学生干部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并组织学校的各类学生活动。此外，由于大部分的高校学生工作依靠学生干部予以传达和落实，学生干部在策划组织学生活动时，也需要与学校各级管理部门进行沟通联络，尤其是与辅导员进行沟通，这提高了他们社会参与的程度。

本研究发现专业类别和院校类型也会对学生的参与产生显著影响。这与此前研究结果相一致²。相对于一般本科院校，各类型高校在学习参与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社会性

¹ 何旭娟. 新时期高校学生干部群体发展现状与培养对策——以湖南高校为例[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7(30):163-166.

² 相对于工科类学生，文史哲类与经法教管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性参与上的程度显著较低，而理农医科学生与工科学生无显著差异。在社会参与方面，文史哲类学生显著高于工科学生，而理农医类学生显著低于工科学生，经法教管类学与工科学生无显著差异。陈萍（2011）曾在研究中发现理工科学生在课程学习方面高于文科生，而文科生在课外活动方面的参与度高于理工科学生。这可能是由于理工科学生面临更大的学业挑

参与方面, 各类型院校差异极大¹。这与此前研究不完全一致²。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级别学生干部之间学生参与程度的差异, 我们将非学生干部作为对照组, 加入分级学生干部虚拟变量, 带入 2011 年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下表 2 所示。在学习性参与方面, 仅院级学生干部的学习性参与程度明显高于非学生干部 (在 5% 水平上), 而班级、校级干部与非学生干部在学习性参与上的差异不显著。在社会性参与上, 三级学生干部的社会性参与程度均高于非学生干部 (在 1% 水平上)。从回归系数上看, 院级学生干部的系数最高, 班级学生干部的系数最低, 由此可见, 院级学生干部的社会性参与程度高于班级和校级学生干部。

表 2 学生参与度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级别学生干部)

	学习性参与	社会性参与
班级学生干部	.468 (1.849)	6.431*** (.687)
院级学生干部	4.129** (2.097)	9.269*** (.773)
校级学生干部	2.720 (2.758)	8.293*** (1.039)
是否控制学生家庭背景变量?	是	是
是否控制高校类型?	是	是
调整 R 方	.014	.093

注: 回归系数为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号中为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 5%, 10% 的水平上显著 (双尾)。

4.2 干部经历和学生参与对学生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为考察学生干部经历和学生参与对学生发展各个维度的影响, 我们将 2010 年数据带入模型 (2) 进行回归 (结果参见表 3)。表 2 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2 和假设 3。

首先, 表 3 显示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的学业发展、思考和认知能力发展、社会意识、以及人际交往与领导力发展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 1% 水平上), 即学生干部在这四个维度上的能力发展明显高于非学生干部。

表 3 学生发展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学生干部虚拟)

战, 因此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采取更为积极的学习行为。文史哲类学生往往学习压力较小, 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各类课外活动或者与辅导员沟通。

¹ “985”院校、“211”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学生自我汇报的社会参与程度显著高于一般本科院校学生, 而独立学院、高职高专院校与一般本科院校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之前有研究 (鲍威, 2010) 表明, 随着学校选拔性的降低, 社会活动和社团活动、勤工助学、锻炼身体在课外自由时间中所占比例升高, 特别是高职高专学生在这些方面花费时间明显较高,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别, 有待进一步讨论。

² 孙沛霖. 大学生课外参与投入及其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0.

	学业发展	思考和认知能力	社会意识	人际交往与领导力	学术能力
学生干部	.239*** (.029)	.211*** (.030)	.113*** (.029)	.227*** (.029)	.048 (.029)
学习性参与残差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1)	.002*** (.001)
社会性参与残差	.007*** (.001)	.013*** (.001)	.016*** (.001)	.027*** (.001)	.011*** (.001)
男性	-.405*** (.031)	.030 (.032)	-.026 (.031)	.199*** (.031)	-.123*** (.031)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6 (.006)	.009 (.006)	.009 (.006)	.006 (.006)	.012** (.006)
母亲受教育年限	-.007 (.006)	-.008 (.006)	-.014** (.006)	.010* (.006)	-.008 (.006)
城市生源	-.088*** (.033)	-.045 (.035)	-.206*** (.034)	.074** (.034)	-.059* (.034)
家庭全年总收入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文史哲虚拟	.189*** (.048)	.084* (.050)	.004 (.049)	.465*** (.049)	-.124** (.049)
经法教管虚拟	.176*** (.038)	-.011 (.040)	.070* (.039)	.190*** (.039)	-.172*** (.039)
理农医虚拟	.017 (.040)	.037 (.042)	-.068* (.041)	-.016 (.041)	-.044 (.041)
高考标准分	.157*** (.021)	-.006 (.021)	.028 (.021)	.015 (.021)	.079*** (.021)
985 虚拟	.308*** (.045)	.026 (.046)	-.024 (.045)	-.028 (.045)	.131*** (.045)
211 虚拟	.199*** (.037)	.075* (.039)	.020 (.038)	.036 (.038)	.084** (.038)
高职高专虚拟	-.574 (.578)	-.269 (.328)	.618* (.320)	.306 (.317)	.131 (.318)
独立院校虚拟	.258** (.127)	-.021 (.135)	.178 (.131)	.060 (.130)	.067 (.131)
(常量)	-.078 (.065)	-.144** (.068)	.118* (.067)	-.643*** (.066)	.105 (.066)
调整 R 方	.150	.035	.054	.138	.041

注：回归系数为未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

其次，学习性参与和社会性参与的确对学生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表 3 结果显示学习性参与可显著地提高学业发展、社会意识、人际交往与领导力，以及学业能力。而社

会性参与对能力发展的所有五个维度均具有显著地积极影响。换言之, 在控制了学生干部对参与的影响后, 学生参与仍然对学生发展产生了显著地积极影响, 这证实了学生参与与理论的预测, 与此前研究结果一致¹。

再次, 我们比较了未控制学生参与和控制了学生参与的学生发展模型的回归结果, 以考察学生参与对干部经历和学生发展关系的中介作用。与未加入学习性参与残差和社会性参与残差的模型相比较², 控制了参与残差的模型中, 在学业发展、思考和认知能力发展以及人际交往与领导力发展这三个维度上, 学生干部经历的回归系数明显变小。由此可知, 学生干部经历的确通过影响学生参与这个中介变量对学生发展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应用 2011 年数据,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各级学生干部之间能力发展程度的差异。我们将非学生干部作为对照组, 加入分级学生干部虚拟变量, 并带入 2011 年样本数据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参见表 4。

表 4 学生发展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级别学生干部)

	学业发展	思考和认知能力	社会意识	人际交往与领导力	学术能力
班级学生干部	.342*** (.046)	.092* (.053)	.103* (.054)	.351*** (.049)	-.055 (.053)
院级学生干部	.460*** (.052)	.051 (.060)	.090 (.062)	.606*** (.056)	-.042 (.060)
校级学生干部	.406*** (.069)	-.050 (.078)	.154* (.080)	.755*** (.073)	-.117 (.078)
学习性参与残差	.001 (.001)	.000 (.001)	.001 (.001)	.002*** (.001)	.001** (.001)
社会性参与残差	.006*** (.001)	.015*** (.001)	.015*** (.001)	.017*** (.001)	.009*** (.001)
是否控制家庭背景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高校类型?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方	.160	.067	.060	.172	.057

注: 回归系数为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号中为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水平上显著 (双尾)。

表 4 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在学业发展上, 三级学生干部均明显高于非学生干部。院级学生干部的回归系数最高, 证明院级学生干部的学业发展程度优于其他两级学生干部。在思考和认知能力发展上, 仅班级学生干部显著优于非学生干部 (在 1%水平上)。

¹ 孙沛春. 大学生课外参与投入及其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0.

² 由于篇幅限制, 未控制学生参与的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发展影响模型结果未在此处显示。如有需要, 请联系作者。

在社会意识发展上, 班级、校级学生干部明显高于非学生干部, 同时校级学生干部的回归系数较高。这表明校级学生干部的社会意识发展程度优于班级学生干部。在人际交往与领导力发展上, 三级学生干部均明显高于非学生干部。在学术能力发展上, 三级学生干部与普通同学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发现与讨论

本研究尝试通过对大规模学生调查的回归分析来研究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和具体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学生干部经历确实会对学生发展产生正向影响, 而这种积极影响主要通过学生参与的中介作用实现。

学生干部经历为何会通过学生参与促进学生各个方面的发展? 首先, 模型(1)结果显示学生干部在高校日常学习中拥有比非学生干部更加主动的学习态度, 更加明确的学习动机, 并且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学习行为。正是由于更投入的参与了课内外的学习活动, 使得学生干部的学业发展上优于其他学生。

其次, 学生干部在协助学校学生工作开展、组织策划学生活动的过程中, 需要面对各种实际问题和突发状况, 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就要求学生干部必须充分认识自身能力与不足; 思维活跃, 能够接收并处理大量信息; 独立处理事务, 发现并解决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干部的社会参与程度。通过学生干部经历, 学生的思考和认知能力将会得到充分的锻炼与发展, 故学生干部在思考和认知能力发展上可能优于其他学生。

此外, 以往研究指出学生干部群体政治上积极进取、信仰坚定, 关心国家命运、爱国意识强烈, 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但同时看重个人的发展, 价值取向务实, 渴望成才, 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¹。因此学生干部可能在社会意识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

再次, 作为高校中各类学生团体的领导者和负责人, 学生干部拥有比普通同学更为广泛的社交范围, 这对学生干部的人际交往能力是极好的锻炼。最重要的是, 学生社团中团队协作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纲领, 学生干部需要在挖掘每个社团成员自身特长的同时关注社团所有成员的配合与协作, 这是对学生干部组织和领导力最好的锻炼, 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因此学生干部在人际交往与领导力发展上会具有较大的优势。

在分析中, 本研究使用了最新的、多年度大规模学生调查数据, 将实证分析建立在可靠的数据基础之上。本研究在讨论学生干部发展状况时采用了学生参与的视角, 这是以往研究未采用的新维度。该视角更好地挖掘出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发展状况影响的具

¹ 张迪. 高校学生干部思想状况调查与分析——以郑州大学等五所高校为例[J]. 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6(17): 17-20.

体机制,指出了在学生干部发展过程中学生参与这一重要中间变量的作用。

5.2 政策建议

(1) 提高学生参与是对学生干部进行培养的有效途径

学生参与是学生干部经历影响学生发展的重要中间变量。换言之,提高学生干部的学生参与度势必会提升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发展的正向影响。这一研究发现对指导各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工作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学生干部的培养工作不应局限在大力开展各类培训上,而是应该注重全面提高学生干部的学习性参与和社会性参与程度。在开展常规性培训的同时,还应该通过组织学生干部参观交流、扩大学生干部自主性管理空间、提高校际联合活动频率、重视学生干部第二课堂学习等方法,为学生干部创造更多的学习性和社会性参与机会,为这些学生干部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从而提升学生干部培养的效果。

(2) 对学生干部的培养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发展

通过本研究的结论可以发现学生干部的发展状况显著优于非学生干部,即对学生干部的培养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发展。这一研究发现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目前高校中大力开展的学生干部培养工作的实际价值。本研究的结论不仅表明我国高校将广泛开展学生干部培养工作作为切入点、以提高整体学生综合素质政策的可行性,同时也为今后学生干部培养工作的继续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各高校可以通过加强高校学生干部群体的培养工作、促进学生干部群体的全面发展、培养和造就一支由各级学生干部组成的优秀队伍。

(3) 学生干部培养工作应加强个性化、差别化建设

本研究发现不同级别的学生干部在能力发展上存在较大差别,而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班级学生干部的能力发展弱于校级和院级干部的发展。在今后的学生干部培养过程中,应着重加强各级学生干部培养工作的个性化、差别化建设,针对不同级别学生干部采取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培养,使各级学生干部的各项能力在个性化定制的培养中得到最大的提升。高校尤其应加强对基层学生干部的培养,扩大班级和院级学生干部的社交范围,打破班级和学院学生工作的独立限制,尽可能多的开展班级联合或学院联合的学生活动,以及横向经验分享和座谈活动。从而开阔基层学生干部视野,提高其地位和影响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使其更好的在基层班级中发挥榜样带动作用。

(4) 建立学生干部能力评价体系,为学生干部的发展设立目标、提供监督

目前,人们对学生干部的认识和评价还存在一定误区。结合本研究的成果,应针对学生干部的发展建立评价体系,对各项能力进行标准化的定义并规定量化指标,其中应包括学生参与和学生发展的各个维度。高校应为学生干部的参与和发展制定一定的目标,

并进行常规性的监测和评价。这样一方面可以为学生干部的发展提供绩效目标和可行性指导, 另一方面, 又可对学生干部进行有效监督, 也为学校及用人单位提供对学生干部可靠的评价方式。